



# “说理人”与“实干家”的结合

——“山药蛋派”作品中党员干部形象塑造的启示

□刘芳坤

自1947年“赵树理方向”浮出水面,到1958年《文艺报》推出“山西文艺特辑”,一个后来在文学史上被称作“山药蛋派”的作家群逐渐确立。赵树理和“晋绥五作家”践行了工农兵文学的道路,更重要的是,竖立起从边区到共和国文学发展中的党员干部形象塑造谱系,并见证了解放区文学进入“当代性”这一重大时刻。以往研究界重视的是“山药蛋派”作为一个乡土文学流派的地性,故而更为看重其农民形象塑造的意义,并由此强调作品中民间伦理的表现。然而,若从政治伦理与民间伦理的转化与融合方面来讲,“山药蛋派”作品中党员干部形象的塑造也许更具况味。因为“山药蛋派”的大众化写法主要表现在广大群众接受政治服务的功能,而党员干部形象即是实现“信服”“接受”的核心环节,是让文学作品达成叙事能效的枢纽。

在谈到文艺的立场对象问题时,《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了“过去的”和“未来的”干部之分,“文艺工作的对象是工农兵及其干部”,学生出身的干部应通过思想改造走入工人农民。“山药蛋派”作为践行《讲话》的典范,其作品全方位描述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农村的变革,不仅展现了农民在这一历史进程中的真实情绪,更描绘了干部由“过去”走向“未来”的形象特征。《李家庄的变迁》中的共产党员小常是学生出身,这位“说真理的好人”第一个将铁锁这样的“草木之人”视为“朋友”。在李家庄的变迁叙事中,赵树理并没有压抑路人小常的学生特质,他写在铁锁的眼中小常“十分漂亮精干,反觉得自己不配跟人家谈话”,可以说在这篇风格明朗的小说中亦展现了知识分子带着自身的明朗特质融入大众革命,并以自己的吸附力为革命助力。后来,小常深入李家庄从事减租减息的根据地建设,成为广受农民爱戴的干部。这一看似简单的书写方法,在中国现代文学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党员干部形象塑造谱系内却具有非凡的意义。20世纪20年代,一批左翼作家即开始了革命者形象塑造的实践,但纵观茅盾、蒋光慈、胡也频等共产党员早期的文学创作,知识分子往往带着个人的局限性进入革命阵营。大革命失败后,一批忧郁、轻狂的党员形象更以“革命+恋爱”的方式登上文学舞台。及至左联成立,丁玲的作品仍然表现出“韦护的两面”,殷夫的诗歌写下了“我已不是我/我的心合着大群燃烧”,可以说,知识分子如何在革命中容纳身心始终是作家思考的问题。赵树理在《讲话》指导下的创作克服了这一形象谱系的难题,毫无违和地展现出“未来干部”的风采。小常的“说理人”优势在小说中表现得比较突出,他能够将阶级分析、《论持久战》以及乡村组织治理的理论转译为农民喜闻乐见的道理,最终让李家庄在正确的理论指导下实现变迁。一

方面,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具有明确的指引下,小常们不再彷徨,已经找到了自身在工农兵中的位置。另一方面,书写主体不再侧重表现知识分子“个人主义”的情绪和追求,不再将个性与社会、个人与时代的抵牾作为叙事张力的建构途径。正如小常所言:“总得叫大家都干起实来,才能算有力量。”“说理人”最终与“实干家”相结合,赵树理由此开辟了一条在实际工作和关系中谱写党员干部形象的路径,从而让长期以来还在“启蒙+抒情”谱系中寻觅的“青春期”党员形象进入到盛年强干阶段。

众所周知,“老百姓喜欢看,政治上起作用”是赵树理创作的价值观,而其在“政治上起作用”方面的着力点不仅在充分汲取民间艺术滋养自身的创作,更重要的是,他认为:“我在做群众工作的过程中,遇到了非解决不可而又不是轻易能解决了的问题,往往就变成所要写的主题。”党员干部在作品中往往承担起解决问题的任务,赵树理及其后继者的书写除了在“说理人”身上下功夫,更重要的是让政治专业化,而非让专业政治化。《实干家潘永福》展现了政治专业化的图景,潘永福作为农村基层干部总是在处理具体的问题,潘永福首先是农民中的好手,其次才负有领导责任。小说从“慈航普渡”开始,五个渡口的老一代船工都是潘永福教会的,这样善于活计的潘永福在搭建桥梁、修建水库和开辟农场的过程中都发挥了自身的专业素养。小说中最为形象的刻画在于,潘永福形成了一套“无差别逻辑”：“屋里和野地差别不大,水里和干地差别不大,白天和夜里差别不大,劳动和休息差别不大”,“苦干实干”的干部形象在赵树理的笔下得到了栩栩如生地展现。“山药蛋派”作家均有长期的基层生活经验,其作品绝非单向度“自上而下”的宣传。在先进干部形象的塑造方面,叙事往往用动作性的书写战胜名词性的描绘,马烽用“新、短、通”概括自己的创作追求,即“题材新、篇幅短、语言通俗。”上世纪50年代,他自愿从北京返回山西阳贾家庄深入生活积累材料,他的一系列代表作均诞生于此时。《我的第一个上级》和《停止办公》均在防灾的场景中塑造了优秀的党员干部形象,小说中的老田和杨书记对工作的专业态度也体现出马烽深入生活的杰出成果,《我的第一个上级》用大半部篇幅描述一次防汛过程,作者对风向、雨量、河道、堤堰的叙述着实令人赞叹。此外,马烽善于用生活中的喜感强化小说的叙事效果。《我的第一个上级》开始出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个低头驼背、戴草帽穿棉裤的怪老头,通过这种欲扬先抑的手法,使得后来老田跳入洪水勇于牺牲的形象更加鲜明。《停止办公》则通过不断抖包袱的写法:杨书记不断打破自己停止办公的约定,甚至从澡堂跑出来继续工作,在

幽默肤白的字面背后是一位为群众服务不眠不休的好干部形象。

由于从实际问题出发,“山药蛋派”文学提供了研究50至70年代中国农村社会丰富的材料,这是以往任何一个文学流派所未能达到的社会学和政治学意义,例如赵树理的《登记》写新婚姻法实施、马烽的《新任队长钱老大》写农业机械化、西戎的《纠纷》反映男女同工同酬问题等等,“山药蛋派”的书写不仅满足于转型社会的心理状态,又不仅关乎制度化的某些教理,这一流派为中国当代现实主义文学撰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在党员形象塑造上,他们秉持“不虚荣、不隐恶”的传统写作风骨,在树立典型的同时写出了部分党员干部的局限性。《登记》中的民事主任自私顽固、王助理敷衍了事,直接导致自由恋爱的青年无法正常登记。《新任队长钱老大》中的赵二刚脱离了农村生产生活实际一味推行机械化,不能充分调动群众积极性。《纠纷》中的李秀英急躁风火,反而激化了男女社员在劳动计分方面的矛盾。西戎在《也谈深入生活问题》中写道,必须克服对生活观察“深有余而人不足”,人物形象不够入木三分的原因在于作品看似表现了生活中的问题,但是作者却缺乏重视“对人的分析和感应,特别是人与人之间所发生的种种微妙复杂的矛盾和心态变化”。“山药蛋派”文学已经超越了一种“虚构”,它实现了历史经验的“对事”和文学经验的“对人”结合,作家可以说抱着政治家、社会学家的态度从事文学创作。马烽创作于1978年的《李德顺和他的女儿》反映了地方政府在推荐下乡知青入学成为工农兵大学生的执行过程中存在的舞弊现象,但这篇小说却超越了伤痕文学暴露叙事的格局,塑造了一个表面唯唯诺诺但内里坚韧顽强、保持党性的基层干部形象。李德顺的女儿获得推荐上大学的名额,但公社副主任高源从中作梗,通过各种手段威胁身为县委秘书的李德顺泄党内文件为自己的政治前途牟利。李德顺不为所动,因为他深知“那样一来,县里的形势会比现在还要乱”。并且,他得到了妻女的谅解,全家人达成“不能拿原则做交易”的共识。最终,李秀秀未能进入大学,但是,这篇小说却体现了在不良政治生态中普通人的品格坚守,作者不

“说理人”与“实干家”结合的干部形象是“山药蛋派”作品之所以具有伦理力量和审美力量的缘由,如今我们再度审视这种发乎于社会生活在经验的创作是非常具有建设性的。



马烽



赵树理

仅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更侧重在历史废墟之上重建理想达成的信念。

“山药蛋派”笔下的农民形象往往表现出时代转折过程中“旧”的因袭,而干部形象在他们的笔下却更多以“青年”的姿态出现,承载了社会动员的叙事效能,体现了新社会发展的历史动力。孙谦在电影文学剧本创作中塑造了一批积极有为的干部形象,如《丰收》中党支部书记陈初元、《一天一夜》中县委工业部部长李玉如、《千秋大业》中团支部书记郑山花等等。剧本中经常使用“光”作为核心意象,如办公室的灯光、建筑工地上的电光、村道上的火光、红旗下的阳光,无不烘托了这些干部能够带领群众前进的治理能力。此外,“山药蛋派”的第一人称叙事也值得重视,马烽《我的第一个上级》《韩梅梅》《三年早知道》,西戎《我掉了队后》《在招待所的日子里》,束为《第一次收获》《十年前》《缺粮户》等作品中的“我”逐渐退出了情节角色,本身作为干部的“我”作为讲述者和见证者的功能被凸现。正如哈贝马斯所认为的,“合法性意味着某种政治秩序被认

可的价值”,作品中第一人非限制性视角的合法性提供了政治秩序价值认可的过程,“山药蛋派”对政治合法性及复杂性的传达,继而在他们在作品中描绘出的特定环境下的干部形象及境遇,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是无可取代的。

“说理人”与“实干家”结合的干部形象是“山药蛋派”作品之所以具有伦理力量和审美力量的缘由,如今我们再度审视这种发乎于社会生活在经验的创作是非常具有建设性的。首先,将文学作品作为历史记忆的一种材料来看,“山药蛋派”提供了一种道德的想象力,甚至可以说是康德所谓的生产性想象力。大批作品无与伦比的在场性超越了许多叙事文本的历史“再造”和经验。任何历史事件都有其内部的和外部的复杂特征,科学、制度无法解释伦理,个体在现存环境中需要何种能动性?“山药蛋派”的洞察力在今天仍具广泛适用性。其次,正因为这种叙事特点,人的主体地位才有了彰显的途径,这往往是笔者在阅读“山药蛋派”作品时的第一个震撼。“说理人”将人物立于民间社会伦理的同时,也将他们放置于历史发展的本质规律的揭示者的位置上,而“实干家”则展现出新人在历史发展中的驾驭感和韧性。最后,当下中国仍处于改革的进程之中,这一进程一方面提供了足够丰富的写作现实素材,另一方面,在此期间的体制、政策、情态、心态也给作家的创作带来了挑战。为此,重新审视“山药蛋派”的现实主义文学,可能会在“写什么”和“怎么写”的两个方面都给予我们一定的启示。

## 评论

### 浓墨重彩描绘“中国名片”

□朱秀海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的序列里,有一艘不带武器装备,没有漆刷铁灰色威武外观的特殊军舰。它的“装备”是手术室、病床、药房和血库,它的“武器”是CT机、X光机、药品、医疗器械,它的船身是通体纯净的白,如同大海上滔滔的浪花,它最醒目的标志,是船舷上大大的红十字……

这艘白色军舰的名字叫“和平方舟”! “和平方舟”号医院船列入12年来,承载着人类对生命的希望,寄托着中国人民对和平的向往,先后9次驶出国门,航行24万余海里,将航迹留在了三大洋六大洲,为43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提供了23万余人次国际人道主义医疗服务,赢得了世界各国人民的爱戴,成为泱泱大国使命形象的闪亮名片。

海军作家沙志亮曾随“和平方舟”号医院船执行“和谐使命—2015”任务,走访了8国9港,历经142天的万里航程。此后,他又几年如一日追寻“和平方舟”列入十多年的历史航迹,翻阅了它9次驶出国门的壮丽画卷,采访了数百名船员和参与任务的官兵,用心、用情、用真诚撰写出了这部长篇报告文学《和平方舟》。

我和沙志亮是原海军政治部创作室的同事和战友,他主要负责编辑《海军文艺》,并利用业余时间创作了不少纪实文学作品,且乐此不疲。记得我曾多次对他说过,“写报告文学不容易,是戴着镣铐跳舞!”作为一个军旅作家,这是我的经验之谈,因为虚拟文体可以自由想象,尽情发挥,而报告文学不仅需要艰苦的采访,还要“以真实为生命”,在选材、创作中受到这样那样的限制,特别是反映部队生活的作品,更要时刻绷紧防止泄密这根弦。

写报告文学确实不容易,写反映“和平方舟”号医院船的报告文学更不容易。“和谐使命”任务重大,时间跨度大,参与人员众多,医学技术密集,政治性强,牵涉面广,给创作带来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然而沙志亮却迎难而上,顽强击。正如他对我说的:“作为一名海军作家,每时每刻都被一种使命激励着,把这次创作的过程视为一次学习冶炼之旅,让自己的灵魂也来一次神圣的洗礼。”



沙志亮是一位有使命、有情怀的军旅作家,这几年他接连创作出几部有分量的大作品,《大国巨舰》描绘的是中国首艘航母辽宁舰官兵的风采,《刀尖上的舞者》讲述的是“航母战斗机英雄试飞员”戴明盟的故事,这次他又捧出30余万字的《和平方舟》,落笔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大主题,记录“和平方舟”号医院船执行“和谐使命”任务的辉煌历程。在创作中,他牢牢记住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这段话:“对中华民族的英雄,要心怀崇敬,浓墨重彩记录英雄、塑造英雄,让英雄在文艺作品中得到传扬,引导人民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绝不做亵渎祖先、亵渎英雄的事情。”因此,在他的笔下,几乎全部呈现的是海军英雄团队、英模人物,为建设世界一流海军鼓与呼。他心中非常清楚:中国海军正在经历一个史无前例的跨越式发展的时期。可以自豪地说,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实现拥有一支强大海军的目标,也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更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作为一名海军作家,为这一伟大目标服务是

自己的使命和责任。

人民海军“和平方舟”号医院船,两次在海上光荣接受习近平主席检阅,被授予“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人民海军70周年突出贡献单位”,多次立功受奖。2019年末,中宣部授予它“时代楷模”荣誉称号。2020年八前夕,习近平主席签署通令,为“和平方舟”号医院船再次记一等功。对于这个英雄集体,沙志亮当仁不让,不惜笔墨,纵情讴歌。在这部作品里,你既能看到任务指挥官纵横四海的战略谋局,还能看到任务官兵战斗英雄群像;既能看到军队医生手术台上的娴熟技艺,还能看到普通船员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既能了解世界各国的历史风情,还能透视官兵及各国民众的内心世界……沙志亮还是一位耐寂寞、有毅力的纪实文学作家。看过这部作品,我了解了他随船执行使命任务,如何和官兵一起经历风浪考验,昼夜兼程,如何深入异国贫困社区,为当地民众进行人道主义医疗服务;完成任务后,依然几年如一日,深入舰艇部队、医院及研究所,采访历次执行使命任务的数百名官兵,可谓是吃得苦、受得了累、锲而不舍、坚韧顽强,所以他的这部作品真实可信感人。

同时,沙志亮还是一位有想法、懂技巧的实力作家。他的语言激情四射,非常有张力,读后令人振奋。他还善于从古人和今人的优秀作品中学习,既懂得师古,又懂得标新。仅从《和平方舟》这部作品的结构上来讲,他就有所创新,用A卷B卷来分述“和平方舟”号医院船所执行的9次“和谐使命”任务。A卷撰写的是他亲身经历,B卷记述的是另外8次使命航程,并且转换得非常自然,衔接得非常贴切,使读者在阅读中置身其中,赏心悦目。

人民海军“和平方舟”号医院船,怀仁扬帆担当大义,博爱奉献救死扶伤,破浪满载和平渴望,握手世界展示形象,在构建“和谐世界”“和谐海洋”的航程中,展现了一张闪亮的中国名片!我相信,沙志亮浓墨重彩描绘的这部长篇报告文学《和平方舟》,也一定会成为他自己的名片,使其成为在军事文学历史上留下痕迹的作家。

### 新时代奋进故事的溯源式讲述

□晏杰雄 秦晓敏

目前,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家成仿吾的评传、回忆录、年谱等已出版多种,但以小说的方式打开成仿吾生平与精神世界,刘美兰长篇小说《梦见仿吾公》还是少有的尝试。小说讲述了一个治愈系的温暖故事:一个外乡来的老年痴呆症患者来到成仿吾家乡新化(古称梅山),仿佛回到故乡,记忆中“老校长”的教诲被唤醒,映照着梅山地区正如火如荼展开的新农村建设。作者采用虚实结合的写作方式,将成仿吾真实的人生与虚构的溁溪村对接糅合,在讲述新时代梅山人的奋斗故事中插入成仿吾的生平事迹。

小说开篇,一个自幼好学、机智聪敏的学者形象跃然纸上,这样的形象在百年后的成其善、成小龙的博闻强识中重新鲜活起来。书中每一个梅山后人现实故事的书写,都有成仿吾的事迹作为引导,成仿吾的精神辉映在每一个梅山子女的生命中。成仿吾是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梅山后人却是作者勾勒的虚拟群体,虚实互动之间营造出一个梅山文明奔腾不息的虔诚世界,梅山后人成对仿吾的回忆与缅怀,使得历史里的成仿吾拨散风烟步步走来,在今天和未来永远地长久地活着。在这样的虚实结合中,成仿吾的生平经历和五个主要事迹凝练出梅山的精神符号:“崇文尚武”,在对梅山精神的发端进行追寻的同时,又真切地观照着梅山精神在当代的传承与延续。虚实结合贯穿作者的行文思路,成为小说的叙事脉络。在真实事迹的指引下,梅山后代的故事书写情理相容,充满了历史的厚重与现实的观照。在这样的书写中,我们随着梅山的子孙,虔诚地靠近梅山的先辈,虔诚地感受着梅山精神强劲跳动的脉搏。在某种意义上,使梅山精神生出继往开来绵延不息的深刻意蕴。

在叙事顺序上,《梦见仿吾公》匠心独具,采用了史今同构的叙事策略。小说没有按照故事原本发生的时间顺序按部就班地构建,而是在行文中不时呈现出一种逆时序的状态,逆时序的三种时间运动轨迹:闪回、闪前、交错在这部小说中皆有呈现,流露出作者不凡的叙事能力。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闪回”叙事。故事中的丁谷雨因为老年痴呆而遗忘了所有的事情,而“老校长”的叮咛却被他只字不差地挂在嘴边,时时念叨。在靳菁与成小龙的陪伴下,丁谷雨怀揣一颗遗忘凡尘的赤子之心寻找着过往,同时,尘封已久的求学往事缓缓展开。故事闪回到丁谷雨的求学年代,闪回到有成仿吾校长无微不至关心的年代。送他粮票,借他书籍,成校长用温暖与善意融化着这个自卑敏感的青年,也将高尚的情怀与闪耀的精神浇灌给了他。不可抗拒的衰老带走了丁谷雨的俗世人

生,而成校长的光芒却在老人灵魂里根深蒂固。故事从丁谷雨的晚年生活开始,而对于求学历史的追溯构成了一个外部闪回的逆时叙述,呈现出老校长对丁谷雨成长的深刻影响,进而由个体衍发群体,在时间和空间的双重交错中展现成仿吾精神对梅山后代的巨大影响。不止丁谷雨,这外部闪回的叙事方式在书中各章节中均有不同程度的体现,如靳菁与陈志高的身世谜团、金锄与木盒的神秘由来。

《梦见仿吾公》不仅仅局限为对梅山地方风土人情的描述,温馨风光之下隐含的是一个宏大的人物群像刻画。故事横亘了梅山三代人之间的爱恨纠葛,人物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是作者精心织就的一张巨大的网,这些处在网格结点的人物在故事的一步发展中,渐渐聚集到了一起,他们的个体命运因新农村文化建设的时代任务而统一在了一起,当然,在庞杂且完整的故事框架下,难以将每个细节面面俱到。作为整部小说的骨架,在书中穿插的成仿吾历史资料与后续叙事结合不够圆融。小说语言整体上透出灵慧之气,但在征引成仿吾资料部分却有点像植入历史“教科书式”的语言。此外,故事情节中某些“偶然”和“巧合”流于刻意。

《梦见仿吾公》根植于梅山厚重的传统文明,从历史的沉积中开掘出启迪现实的精神财富。成仿吾已经不仅仅是梅山里走出的杰出人物,更是滚烫的梅山精神的象征。梅山今天的劳动者用古朴或前卫的方式,遵循又传承着先贤成仿吾的精神生命,将山峦重叠的土地建设成为安宁富庶的村庄。作者热烈地爱着梅山这片土地,虔诚地信仰着梅山精神。这样的力量不应被时代齿轮碾压,应当在民族复兴的潮流中熠熠生辉,照耀当代和未来。